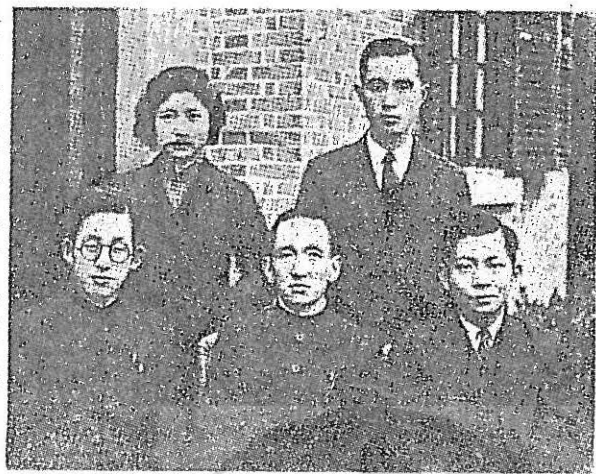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士典型陳布雷（下）

費 雲 文



陳布雷先生（前排中）與同胞兄弟合影。

入典機要盡瘁竭忠

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，南昌行營撤銷，軍委會修改侍從室組織，分設一二兩處：第一處設總務、參謀、警衛三組；第二處設秘書、研究兩組。任陳布雷為第二處主任，二月，赴漢口任職，兼研究組長。侍從室第二處的執掌，凡是有關黨政各部門，向蔣委員長提出的報告或請示事項，（包括情報在內），都由二處先加整理或加註意見，然後呈核，所以本質上還是蔣委員長的私人秘書。此一制度，在編制上是屬於軍委會的；但真正的性質，歷史上還少見。勉強作一比較，有點像清代的軍機處。

他所執掌的範圍如此之廣，但內部的組織却很簡單，一共祇有五十多人。他的主任辦公室，實際上就是他個人的住宅，祇有兩三個職員，有一位長於書法的金先生，一個辦事務的職員，一個副官。後來才增加一位翁祕書。一直到重慶，都是如此。

侍二處對外不行文，如有必要，用「陳布雷」三字；如以蔣委員長名義對外行文，下面註明「侍秘二」等字，大家知道這才是由蔣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發出來的；和其他單位不同。大家還辦起來，特著效率。

他個性很豪爽，交往的人很多。自從就任侍從室的職務後，一改豪放而為謹慎，非常嚴肅，親朋的交往也很少了；甚至經常不能回家，也不能應酬，大家自然養成保密習慣。如發生重大事情時，他更能好幾天不下樓，連吃飯都在樓上。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蔣委員長為追剿共匪，駐節貴陽，一面籌劃國家大計，召他前往相助，起草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」。當時人少事繁，尚需親自處理公牘。

十一月，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他為蔣公撰重要外交報告，闡明重要而嚴正的立場：「和平未至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，犧牲未至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

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十二月「西安事變」，在京要人，均在何應欽家集會，決定召開

臨時「中常會」，由于右任主席，宣讀張學良的荒謬來電，人人憤慨，決議出兵討逆，至夜深三時始散會。接着開「中央政治會議」，照案通過。此後十數日之間，他的繁忙痛苦，勞得焦憤，難以形容。

當時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為「中政會」，主席汪精衛，副主席蔣中正均不在京，代秘書長朱家驊為浙江省政府主席，在杭州；陳布雷兼任副秘書長，不得不負起會議的全盤事務，四位院長的意見，難以一致，使他無所適從，祇有與葉楚滄、陳果夫、陳立夫、曾養甫等人商榷。

他自以身居侍從職員，而獨不能與前方諸同人共患難，懷念蔣公的近況，憂慮前途的茫茫，每天悵惘，如有所失，和他接近的朋友，深恐他以身殉領袖；程滄波等人，輪流陪伴他。

他雖說憂愁，但為了營救蔣公，却也不遺餘力，如：

(一)張季鸞與他商量，運用某方面外交力量；他力勸張季鸞在大公報上擁護中央討伐叛逆立場。

(二)與陳立夫、曾養甫聯名勸張學良。

(三)代黃埔同學會擬發警告電文。

(四)協同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。

此其間，雖然晝夜奔走，睡眠極少；但其一份忠憤耿耿的精神力量，竟能支持其原本弱質的體力。廿五日晚，得蔣公已安抵洛陽之訊，始釋然安眠。

次年二月，再為蔣公撰「西安半月記」。

寧靜致遠淡泊明志

抗戰開始，軍委會擴大編制，設秘書廳，張羣為秘書長，他兼任副秘書長。「中政會」也暫停舉行，改為「國防最高會議」，黨政各部均一體參加，仍以汪精衛為主席，張羣任秘書長，他兼任副秘書長，經常出席會議。(後來改為國防最高委員會，蔣公兼委員長，秘書長、副秘書長仍舊)。

戰事範圍日廣，各種專門問題，固待搜集材料，分類研究，貢獻統帥；而各方條陳，或請示裁決之件，有時也非先經簽擬，則統帥無從加以審擇決定者。此事，戰前即有人建議組織「智囊團」。他以為中國專家有限，有學問而又能以公正奉職，不植黨羽，不存個人誇耀觀念者更不多。所以他主張延攬有專門學問而又通曉政理者若干人，以備諮詢，或奉交研究審核專門問題，以為獻替。於是，他以此旨趣，請於蔣公，在軍委會內設置「參事室」。

自五月至七月，蔣公籌劃成立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；他奉命準備文字，並參加討論章程，頗費心力。七月，正式成立；他以臨時幹事兼常務幹事。

武漢棄守前，十月廿一、二日，在敵機終日盤旋之下，他奉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文件。當時，侍從室已奉命於廿三、四日以前，遷往湖南，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，第一批黨秘書等於廿一日夜間起程，同仁堅決主張他應隨第一批先行離開武漢。但他因工作未完，正草擬作戰命令，

不得不再留一日，於是令座車先行，決定自己改乘小船動身，不料因此引起一場劫難。

廿二日下午五時，他謁別蔣公，傍晚坐小船悄然離開武漢。廿三日下午一時，舟過新堤四十里許之王家鎮，突遭敵機一再掃射，情勢危急。他內心鎮定，閉目自持，感念抗戰時期，前後方犧牲衆多；自己生平對國家雖無大貢獻，然而立身行己，差無愧怍。結果，船上有隨員一人、衛士六人、船員二人受傷，船已不能行動。救傷患和繼續趕路，都成問題。結果，在同仁的努力和當地人民的協助之下，才完成療傷患、葬殉難、修船身、僱船員等事；于廿六日下午五時始到達沙市。

此後，經過衡山、桂林，于十二月七日與蔣公司赴重慶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汪精衛藉口赴成都中央軍校，而秘密潛往昆明，誘惑龍雲和他發動一次政變，搞「和平運動」，反對長期抗戰。龍未表明態度，汪乃于廿一日抵達越南的河內。廿二日，日本政府即發出一項「近衛三原則」的聲明，提出了所謂「東亞新秩序」，好讓汪用為根據，向國內發動「和平運動」。

廿六日，陳布雷奉命撰擬駁斥近衛「東亞新秩序」講詞，為爭取時間，于一日之內趕撰完成，于廿八日發表。雄偉有力，分析明澈；名報人張季鸞，稱贊為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文字，極具振奮民心士氣的力量。

所以，當次(廿九)日，汪精衛自河內發表響應近衛聲明的主和的「豔電」後；不但絲毫不

能發生鼓勵人心的效果，反而為廣大的軍民所不齒。

民國廿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一月，國民黨中央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。於是他撰擬講詞、整理記錄、起草宣言；以及二、三月間撰擬「行的道理」、「政治的道理」、「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序」，均能在體力精神狀況良好的情況之下，順利完成。此二月中，為他工作最愉快時期。

十二月六日，他五十壽辰，蔣公親筆書贈「寧靜致遠、淡泊明志」八字，為他祝嘏。

這八個字，本是諸葛亮用來自況自勉的；蔣公以此為他祝嘏，頗具深意。因為他輔佐蔣公，真正做到無名英雄的境地，所有工作，都為蔣公而努力，他每天不分日夜的工作，蔣公隨時都可找到他。他任蔣公機密幕僚長的工作近廿年，始終得到蔣公最高信任，不是倖倖的；而是他有高潔的人格修養和負責的工作態度。

超然立場協和各方

由於陳布雷不常公開露面，引起新聞記者的注意，有位重慶「新日報」的蒲熙修女記者，再三要求陳立夫介紹他，很冒失的問他屬於國民黨的那一派；他雖然不高興，但却很風趣的回答他說：

「這好比待字閨中的少女，你要問她愛人是誰？她勢必難以回答。我在國民黨中的朋友很多……各方面都很接近。」

他以輕鬆的語調，表示他的超然立場。正因

為他的超然地位，所以常能調和各方的意見，而歸到一個核心，所以他的緣很好。

他的超然地位，是出諸天賦而深厚的人格修養，為蔣委員長股肱多年，從不恃權，也從不向蔣委員長輕易保薦人，搞私人關係。

正因為他能調和各方面的意見，有時還得替蔣委員長解決難題。

當政治協商時期，昆明西南聯大，在共黨外圍「民主同盟」份子鼓動之下，發生學潮，佔據學校，示威遊行，不可理喻。蔣委員長下令陳布雷召集一個小組，包括中央宣傳部、三民主義青年團、教育部等高級人員，為處理中心。問題最嚴重時，蔣委員長下令解散西南聯大，遣返學生回家，由駐軍負責辦理。命令下達後，離渝出巡；教育部長朱家驊也出差在外。

他為執行此命令，非常慎重。因為朱部長也離渝，無可商量，如照慣例，奉諭照轉，則此關係各方面的大事，如何圓滑協調，順利執行成功，同時還得體念蔣委員長的苦心，是否真的要解散西南聯大？

他體察當時情形，如果真的要解散西南聯大，則將被共黨及其同路人，引為口實，在其他各地鼓動學潮；也非處理問題的上策。於是，由他提出小組會議討論，採取下列步驟：

1. 先電呈蔣委員長，請暫緩解散西南聯大。
2. 對學校各方面採疏導辦法：

(1) 暗示各公正教授，最高當局有解散學校與軍事接管之籌劃；為了學校前途，大家應當挺身而出，疏導學生，不受裏脅

(2) 策動有家可歸的學生家長，先召回其子弟，等學校復課通知，再行返校。

(3) 通知昆明部隊，作接管學校的準備。

如此多方配合進行，風潮乃告平息，陳布雷處事的謹慎細密與蔣委員長分勞解紛，大多類此。

他的處事，看似消極，其實積極。在重慶的一天，邵毓麟曾問他：「先生對領袖的貢獻，究竟在那裏？」他回答說：

「委員長是全國領袖，繫國家安危於一身。譬如說他是「火車頭」，牽拉着滿載全國軍民長列火車前進，有時速度太快，略基不平，左右顛擺太猛的話，難免沒有危險。我的作用，等於「剎車」，必要時可使速度稍減，保持平穩。這就是我一點微小的貢獻。」

當行憲開始之時，他于民國三十六年，以二、八四二高票當選為慈谿縣國大代表，軍委會已撤銷，總統府將正式成立，蔣公有意讓他出任秘書長；他表示自己願任國策顧問。謙讓恬淡，可見一般。

民國行憲政府成立，他以國民政府委員兼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，仍然參與機要，為蔣公的幕僚。

憂國傷時感激輕生

抗戰勝利後，當政治協商時期，我們在政治上正處於不利的形勢，他感到時局危殆。許多黨

(下) 雷布陳典型士國

政同志，爲了私人利益，不能忍讓團結。共黨的陰謀毒辣心機反覆無常，一般政客의 驚慌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自民國卅四年勝利至卅六年行憲，複雜曲折；政治上種種問題，加以大家對共產黨的眞面目，很少認識，也很少警惕。因此，他始終憂心焦慮，不能忘懷。他曾經向他的胞弟叔同表示：

「從訓政時期過渡到憲政時期，這中間脫了節。」

民國卅七年，共匪猖獗，大局惡化。一年以來，經濟的恐慌，政治的危機，軍事的挫折，嚴重事件，紛至沓來；他廿年的經驗，很明瞭，這都是過去的結果；同時也更爲當前的危機，憂愁焦急。

當軍事情勢顯明的逆轉，金元券實施後限價政策迅速動搖之際，各方面意見紛紛，多想經由他上達蔣公，秘書蔣君章爲了避免刺激他，都在取得他的信任下，相機處理。可是，有些事，却無法隱瞞他。如當時食品已造成黑市，鄉間糧物，不再進入城內；城內糧商也囤積不售，加以不肖份子故意搗亂，乃有山西路一帶搶米的風波。人聲吶喊，傳入他的辦公室。他多次在後窗眺望，表情凝重，無語而退。同仁們想盡方法，想讓他開心一下，均屬無效。

因爲他的憂，是公憂不是私憂。他的終身之憂，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；而終朝戚戚的，是天下國家之憂，是領袖之憂。

他的體質，本來孱弱，早年因家庭變故，耗費心血；在上海從事報業，日夜辛勞，神經衰弱

之症，益見加深。後來從政，担任蔣公幕僚重任，處理機要。隨時局發展，憂勞益多，經常失眠，每晚全賴服安眠藥，始能入睡。

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國民黨「中央政治委員會」舉行臨時會議，他飽受刺激，回到辦公處所，臉色大變。他鑒於「中朝大官老于事，詎知感激徒媿阿」，決心做一位「感激輕生之士」，而于次夜仰藥殉國了。年五十九歲。

他的老友程滄波先生曾輓他一聯云：

「血淚伴忠魂，江山無恙。」

「死生關大計，社稷有靈」相當痛切。他遺有上總統書云：

「介公總裁鈞鑒：

布雷追隨卅年，受知深切，任何痛苦，均應承當，以期無負教誨。但今春以來，目睹耳聞，飽受刺激。入夏秋後，病象日增，神經極度衰弱，實以不堪勉強維持。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，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効命之能力。與其偷生戶位，使公誤計，以爲尙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，因而貽誤公務；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爲役，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。凡此狂愚之思想，純係心理之失常。讀公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，深感此舉爲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，實無面目再求有諒。縱有百功，亦不能掩此一眚；況自問生平，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？天佑中國，必能轉危爲安，惟公善保政躬，頤養天和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，而庇護我四萬萬五千萬之同胞

。回憶許身麾下，本置生死於度外；豈料今日，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，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。書生無用，負國負公，眞不知何詞以能解也。夫人前並致敬意。部屬布雷負罪謹上。

介公再鑒：

當此前方捷報頻傳，後方秩序漸隱之時，而布雷乃忽傳狂疾，以致不起，不能分公憂勞，反貽公以刺激，實萬萬無詞以自解。然布雷此意，早動於數年之前，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。常語「瓶子傾兮，惟壘之恥」之句，抑抑不可終日。黨國艱危至此，賤體久久不能自振，年迫衰暮，無補危時。韓愈有一「中朝大官老于事，詎知感激徒媿阿」。布雷自問良知，實覺此時，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。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，長日回皇，慚憤無比。昔者，公開業舉詆總理之言，而置箸不食。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赤毒素宣傳，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，不知凡幾。回憶在渝，當卅二年時，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，而四、五年來，布雷實毫未盡力，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。即此一端，又萬萬無可自全之理。我心純潔質直，除忠於我公之外，毫無其他私心，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梅毒，出於此無悲諒之結局，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。敢爲我公陳之。」

他這封上總統書，不但顯現他感激輕生的一

抱負；而且也自然流露出他對蔣公的竭誠忠義。感人至深。

廉正謹嚴其心如秤

他替蔣公掌理機要，却始終保留一位報人的本色，居政治中樞，而對政治保持客觀的批判精神，處理許多複雜問題，所以蔣公很尊重他，稱他為「布雷先生」。

他是一個極端謹慎的人，不誇誇、不浮誇，雖然內心有不可逾越的尺度，其人格也有不可侵犯的尊嚴。但待人接物，仍為書生本色，既無所謂「冷冰冰」，也無所謂「熱烘烘」；廿年中不改常態。

可是，他也是一位極富正義感的好人。在重慶時，某次開國民黨全會，黃宇人發言失當。他却一改常態的突然起身，義正詞嚴的大聲斥責，頗使全場肅然。

他在蔣公左右綜理機要，由於公務關係，和各方面多所接觸；他却秉持正義，從無偏向。當時，常常有人向他說長道短，希望透過他向蔣公反應。他為之痛心疾首；而為我政治前途擔憂，當然，他不曾人云亦云地向蔣公反應。

民國卅四年，國民黨六大大會，蔣公希望接握些不偏不倚的人才，來担任中委；問他有無適當人選？他為了不再增加蔣公的困擾，未提一人。

諸葛亮曾說：「吾心如秤，不能為人作輕重」，正是他畢生行誼的大好寫照。

他的負責精神，也很難能。他的全部時間和

精神，都用於為蔣公分憂解勞的工作方面。無論是在南京、重慶，無論日夜，總是留在一角小樓中，一邊是臥舖，一邊是書桌，幾張普通沙發椅，另外一張高枕沙發，為他疲勞休息之用。蔣公有電話，便由他自己接。

在重慶時，他的繼配王氏夫人住老鷹岩，他有時返家，一宿即返；在南京時，王氏夫人住上海，他除了體力不支需要休養，以及陰曆過年以外；絕不離京一步。他真可說是沒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。

凡是經過他轉呈蔣公的任何文件，他都仔仔細細的過目，絕不掉以輕心，有一次，吳經熊替蔣公翻譯聖詠（詩篇），因為蔣公催索譯稿甚急，而吳事忙，認為其中「宗徒大事記」比較容易，便托他的某學生代譯，繕抄也不工整。陳布雷就未代轉，很客氣的退回，附一小箋，略述所見。

他操守的廉潔，和克己的功夫，也很少見。他個人的生活，只靠薪水袋和逢年過節蔣公贈送他的特別程儀，但他仍從從儉中，分一部份獎勵處內同仁。他自己飲食與處內同仁一樣，四菜一湯，都是尋常菜色；同仁們有時替他準備些紅棗燉雞之類的營養較好的食物，他也不願獨享。但對同仁生活的清苦，甚為關切，常替大家墊付一日伙食費，月終歸墊。可是，當時幣值不穩，月初月終，相差很大。在重慶時，程滄波常在傍晚由上清寺到他的住處，他留程晚飯，叫傭人加菜，每次祇有兩個雞蛋，這就是他清苦的「惠幕」生活。

抗戰勝利，蔣公知道他生活清苦，曾先後發

表他為「中央日報董事長」、「四明銀行董事長」，他均謙辭不就。他易簣之前，蔣君章替他安排遺產，六位公子和二位小姐，每人僅分得金元券三千元。

他是位嚴謹的人，可是有時仍不忘幽默。張道藩和他交誼深切，曾任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，後來歷任教育、交通、內政諸部次長，係法國留學生，學戲劇，曾編「密碼碼」劇本，從事文藝活動。他特以「聯贈嘲云：

「教育、交通、內政，一次二次三次，是何其次也，豈克不後已而求其次？國畫、小說、戲劇，心長才長藝長，既無所不長，何妨一搨括子盡其所長」

張得此聯，非常欣賞，特為書寫於扇面，留為紀念。陳布雷生于國家多難時期，受蔣公特達之知，以儒家的素養氣節，鞠躬盡瘁，忠於黨國，忠於蔣公，最後復以孤憤難抑的情懷，感激輕生，振風俗世；他確是一位代表我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的「國士」典型人物。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

費雲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一插圖



上圖：陳布雷（右四）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時與張人傑主席（右五）等合影。
下圖：右起陳紹寬、陳布雷、袁同禮、羅家倫、張羣民國十七年八月在北平合影。